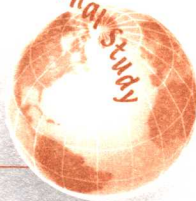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y



国际问题论丛

转型的 中亚和中国

*The Central Asia
in Transformation and China*

杨恕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1世纪初中亚格局变化趋势和我国与中亚关系战略”

(项目号: 99BGJ003) 最终成果

转型的 中亚和中国

*The Central Asia
in Transformation and China*

杨恕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的中亚和中国/杨恕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
(国际问题论丛)

ISBN 7-301-09072-2

I. 转… II. 杨… III. 政治—研究—中亚 IV. D7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5292 号

书 名: 转型的中亚和中国

著作责任者: 杨 恕 著

责任编辑: 杨立范 王建君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072-2/D · 119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0.125 印张 300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内容简介

杨恕,男,1947年生。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1984年12月在兰州大学获硕士学位。1985年2月—1988年8月在兰州大学任教。1988年8月—1991年10月在驻苏联大使馆教育处任二等秘书。1991年11月至今在兰州大学工作。现任兰州大学副校长、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国际政治系教授。并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及该学会中亚中心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发表关于中亚和国际问题的论文50余篇,专(译)著5部。

前言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 世纪初中亚格局变化趋势和我国与中亚关系战略”(项目号:99BGJ003)的最终成果。中亚五国独立后,中国立即与他们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一直稳步发展,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1996 年 4 月 26 日,中、俄、哈、吉、塔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标志着中国与中亚的合作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1 年 6 月 15 日,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乌兹别克斯坦又成为成员国。2003 年 5 月 29 日,6 个成员国元首在圣彼得堡正式决定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常设机构——秘书处,并设在北京,这表明,中国与中亚间的合作已成为各国的“常任”使命。

中亚五国与中国在多方面有着历史传统联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又是中国的邻国,有共同边界三千余公里,发展和巩固友好睦邻关系,无疑是双方具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任务。在双方的交流和合作中,应该努力探索新的合作理念,新的合作空间,寻求更有效的合作方式,以扩大合作的规模和取得更多的成果。中亚五国独立已 13 年,社会转型的过程虽已经历了决定性的阶段,但仍在继续之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确立,法律和管理体系也已建成,但不确定的因素还有许多,最终达到的目标也有不少不确之处。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这些国家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双方的合作。因此,此时对中亚各国的研究,自然就更具有重要意义。几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关于中亚的学术成果问世,对中亚社会的方方

面面作了分析和研究,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对书的内容曾作了再三考虑和取舍,最后确定了现在的结构。主要的想法是,在对中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出分析时,尽量不与已出版的著作相重复。基于这种考虑,对中亚外交没有作专门论述,对其经济的分析着重于转型过程,而对中亚的政治文化、政治转型、地缘政治等则专门设章作了较多的论述。

中亚五国独立以来,其政治转轨已基本完成,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被全部改变。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已不具有影响力。民主和法制成为主流思潮,但对民主和法制的内涵尚缺乏一致的认识。各国对总统权力的界定和权威性所表现出的差别,就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各国尽管都否定了社会主义,但社会价值取向并不明确,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以及不同宗教的价值观和不同传统文化所承载的价值观混合在一起。作为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也远不是一个广为接受的思想。对于国家建设,卡里莫夫总统说:“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稳定的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开放的对外政策、坚强有力的民主法制国家和公民社会。”^①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或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总统的集权或许是必要的,这至少能够维护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应该承认,中亚五国的社会转型是平稳的、成功的,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独立以来,中亚五国面临的重大任务是经济改革。经过多年的努力,中亚五国除重要领域如航空、军工外,私有化已大体完成。但改制并不能根本解决企业的效益问题。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仍处于初始阶段,估计还要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大致从1996年起,中亚五国经济停止了下滑,开始缓慢回升,但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又延缓了这一过程。情况表明,经济状况较好的三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其经济增长的相当部分是由能源产业完成的,技术贡献低,传统产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目前,中亚各国农业的发展也还有很多问题,突出表现是集体或国营农业解体后,个

^① 伊斯拉姆·卡里莫夫:《乌兹别克斯坦沿着深化改革的道路前进》,国际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VⅢ页。

体农户根本无力进行农业现代化改造。近年来出现的以新形式组织生产的私营农场规模不大,数量不多,但已经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中亚农业的发展趋势可能是农业的集约化(即大规模的私营农场)和现代化,在提高产量和产值的同时完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如果是这样,土地的兼并和农业资源的集中就必然出现,有可能引起更多的深层次的社会变化。

在中亚五国刚独立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曾是时髦的现象,许多人对它们的发展感到担心,然而,事实表明,这两种社会力量都没有向极端的方向发展,只是成为多元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普通因素。当然,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亚的一些地区造成了很大危害,但它已被排除于社会的主流思想之外,成为非法的势力。

中亚五国独立十多年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或基本完成,或正在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中亚的政治文化传统、国际环境的影响、国家的现实利益是驱动和支配国家行为的三个关键因素。三者互相交错,互相制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无论当前还是今后,这三个因素都是中亚各国领导集团自我表达的平台,也是外界研究中亚的枢纽,更是我们制定中亚政策的外部基础。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一些尚未发表的会议论文、资料以及一些学者的发言,在此不一一指出。对这些学者的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目录

前言.....	(1)
---------	-----

第一章 历史上的中亚政治文化.....	(1)
---------------------	-----

一、古代中亚的政治文化或主流文明底蕴特点的 形成及其与政治史的关系	(3)
二、古代中亚政治文化的专制主义特色与 宗教的政治化	(12)
三、沙俄时期中亚政治文化的变迁与沦落	(19)
四、苏联时期中亚政治亚文化中分立主义特征的 形成及其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28)

第二章 中亚的地缘政治	(41)
-------------------	------

一、中亚地缘政治简史	(41)
二、中亚地缘政治的自然基础	(44)
三、中亚五国地缘政治简述	(48)
四、里海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作用	(59)
五、阿富汗对中亚的地缘政治作用	(80)

第三章 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建立	(87)
-----------------------	------

一、独立后中亚各国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形成	(87)
二、产业—金融集团对政治体制的作用	(92)

三、民族—地域集团对中亚各国政治体制的影响	(93)
四、伊斯兰教对中亚各国政局的作用和影响	(97)
五、军队和强力部门在中亚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 地位	(100)
六、尚待完善的中亚五国现行政治体制	(102)
第四章 中亚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延续性、转型及发展 趋势	(106)
一、19 世纪中叶至十月革命前中亚地区的 社会经济制度历史回顾	(106)
二、苏联时期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亚地区各国的 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与变化	(110)
三、独立后中亚五国的经济转型	(123)
四、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各国经济的新发展—— 从地区到国别的考察	(148)
五、中亚五国经济形势对政治格局走向的影响	(168)
第五章 中亚五国安全战略及防务政策	(184)
一、中亚五国的安全战略及防务政策	(184)
二、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安全合作的新模式及其 所面临的挑战	(218)
第六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现状及未来	(229)
一、中亚地区的热点问题	(229)
二、“9·11”事件以后中亚形势的新特点	(243)
三、中亚热点问题对中国的影响	(249)
四、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现状	(258)
五、积极推进和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构筑当代“丝绸之路”之辉煌	(264)
六、稳步发展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的展望与思考	(266)
结束语	(271)
附录：中亚五国十年大事记(1992 年 1 月 1 日～ 2001 年 12 月 31 日)	(273)

第一章

历史上的中亚政治文化

世界上有很多地区,在其历史上存在着多种文化的交融和冲突,这种交融和冲突,既是一个相互促进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彼此否定的过程,其正面的和负面的作用 and 影响将长期存在。中亚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多种文化在这里生存、发展、冲突,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成为主导文化。文化不仅体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当文化与国家政治行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政治文化。更明确一些说,政治文化是指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行为取向模式。它有历史继承性,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联系,又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在社会历史的不同阶段体现不同的阶级性,并不断发展变化。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并长期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历史是现实的积累,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当我们今天对中亚的政治局势进行研究的时候,不能不去了解中亚政治文化的历史。中亚古代政治文化在中亚古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几个重大的政治命运变化阶段,在其地区政权时期、并入沙俄时期及加入苏联时期这些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亚独特的政治文化。严格地说,其中相当长的时期它是作为政治亚文化的形态存在的,即是作为沙俄和苏联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存在,但都具有其特殊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民族政治心理。关于政治亚文化的概念,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

德指出,由于一个政治体系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各阶级所构成的,因此他们都可能特殊的倾向或趋向,他把这些特殊的倾向称为亚文化。他特别强调:“有些亚文化具有自己的特性,人们对此是难以漠然视之的,尤其是涉及语言、阶级、宗教和种姓等级长期分裂的情况时……政治亚文化的差别给任何一个政权都带来了许多问题……”,而“如果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对现存的社会体系感到满意,那么政治进程就可能发展平稳”。^①显然,为了防止亚文化变异而完善社会体系,促进亚文化与主流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并从历史的各个角度研究政治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保持国家稳定,是每个国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对有关国家和地区主流政治文化和政治亚文化的研究,是一种以新的文化视角总结过去的政治史和展现未来国家政治前景的现代研究方法。中亚地区由于其地理、民族、经济等条件及其历史上长期处于非独立国家地位,加之历史上又经历过巨大的文化变异,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复合文明底蕴和较脆弱的政治文化。现在,中亚正处于政治复兴的新世纪,按其诸文明交汇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今后它的政治文化发展必然仍会受周围邻国的影响和牵制,但前景究竟如何,至今尚未明朗。它与西亚等穆斯林国家有宗教与语言的文化认同关系;它与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有一百多年难以割断的多方面联系;它与儒家文明底蕴的中国也有众多同源跨民族相邻而居;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亚驻军,西方在中亚的影响将不断扩大。若按亨廷顿的说法,这应是“文明的冲突”最易发生的“不同文明之间的断层……”^②。因此,中亚这样的地带难免将成为新世纪国际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它不能不受到多极文

① 加·阿·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②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刊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转引自1993年8月24日《参考资料》。文章认为:“今后主要的全球性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或集团之间”,“不按政治或经济制度,不按经济发展水平,而按文化背景来划分国家,这要具有大得多的意义”,他把今天世界上的文明划分为西方、儒教、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东正教、拉美、非洲文明,并说文明的冲突就将发生在以上“不同文明之间的断层上。”

明世界各方的特殊的关注。而要深入地了解它在国际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中的独特地位的具体内涵,要较准确地把握未来中亚的政治前景并制定出我们的正确政策,就必须了解中亚过去的主流政治文化及其作为亚文化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轨迹。

一、古代中亚的政治文化或主流文明底蕴特点的形成及其与政治史的关系

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前(中国黄帝传说之前),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经的两河流域一带便出现了大量泥板图书(比甲骨文早近二千年)。所以,中亚一般被认为是人类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众所周知,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区:一方面由于古代中亚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的中枢地带,控制了中亚的丝路要隘,也就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使中亚成了各文明古国争夺的贸易通道,其政治史也与一些著名帝国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中亚战略地位的重要;另一方面,中亚两河流域的大片草原与卡拉库姆、克孜尔库姆等沙漠组成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既宜于游牧(草原),又适于农耕(绿洲),于是中亚又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争夺和活动的舞台。这样,在漫长的文化和民族的交融碰撞过程中,中亚既有连接丝绸之路东西文明的荣誉,也上演过无数民族厮杀的悲剧。无论是来自西方的古代文明帝国还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征服王朝”,都靠中亚加强自己的强国地位。所以中亚古代历史上,从公元前 529 年波斯帝国侵入到 19 世纪后半叶沙俄最终吞并中亚诸汗国,二十多个世纪的中亚政治史,严格地说,仅在一个多世纪中建立过原伊朗语民族基本统一中亚的三个独立国家(即塔赫尔王朝、萨法尔王朝和萨曼王朝,详见后文),而中亚其余漫长的时期则都是因强权国家和游牧民族争来夺去而频繁更易统治者的悲剧性历史。这不能不给中亚的政治文化打上深深的政治不稳定性、脆弱性和附属性的烙印。

公元前 529 年,波斯阿赫米尼德王朝的居鲁士(公元前 558~前 529 年)“控制了乌浒水(阿姆河)和药杀水(锡尔河)之间的很大一部

分地区”。^①虽然居鲁士本人战死在对中亚的征服战争中,但他使波斯帝国统治中亚达两个多世纪,留下了波斯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宗教文化及其它文化艺术、阿拉米亚文字等波斯文明。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从希腊北马其顿出发,联络希腊王公挥师东向,征服波斯帝国和中亚两河流域,其兵锋直达印度河流域。亚历山大帝国像波斯帝国一样,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虽然有一些文化传播,但与当地文化的结合却未能生根,主要是推行一种军政结合的体制。所以,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一死,帝国便因军政人物夺权而分裂。公元前312年塞琉古在叙利亚立国,中国史书称条支国,此后中亚受希腊系塞琉古王朝的统治,又开始了希腊化时期。这时,希腊—巴克特里亚占有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及土库曼东南,就是中国张骞通西域时所称之大夏国。张骞时大夏官方文字均用希腊文,希腊语也是商业上和上层社会中通用的语言,且到处可见希腊艺术风格的雕塑。塞琉古王朝的中亚省区设在巴克特里亚、粟特和马尔基阿纳等中亚中部地区,也是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王朝。如果说亚历山大还重视地方的民族传统,企图把希腊文化同中亚的地方文化结合起来,采取“优遇”政策^②,并在中亚各地建城,把希腊人、马其顿人、伊朗人迁到这些城市推行移民实边一类政策,那么,塞琉古王朝则企图推行希腊单一文化,并力图改变巴克特里亚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而确立希腊宗教。但巴克特里亚的大多数居民仍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尤其是在巴克特拉城,琐罗亚斯德教的祠庙仍然存在,众多朝圣者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③这是因为琐罗亚斯德教吸收了中亚伊兰民族的原始信仰和对太阳神的崇拜等当地文化成分而具有了生命力。公元前250

① 崔连仲主编:《世界史·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

② 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第50页认为:“自亚历山大东征,打破波斯之势力,亘比一带之诸国,皆被占领,其时,大王对于巴克特里亚人颇加优遇,而巴克特里亚人对于希腊文化亦颇容受之,于是此国在东方遂为希腊文化之中心地”,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

③ 加富罗夫著、肖致兴译:《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

年,巴克特里亚希腊总督狄奥多特宣布脱离塞琉古独立,这使塞琉古王朝对中亚中心地带的控制仅存在了62年。中亚政治的不稳定性是一种传统的表现,如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古与埃及的托勒密争霸之时,除了巴克特里亚乘机独立(包括粟特领土)外,今中亚土库曼南部到伊朗东北一带的帕提亚游牧部落也建立了著名的阿尔萨息王朝,它也是伊朗历史上的重要王朝,但包括中亚部分领土,即中国史书上所称的安息。这里的文化反对希腊化,仍保存了波斯文化体系,并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心。从出土货币看,用阿拉米亚文代替了希腊文,但安息的政治制度文化则开始表现出政教结合的倾向。帕提亚王权由贵族长老议事会和琐罗亚斯德教僧侣祭祀议事会组成,其权力大到可以废黜或拥立国王,但军权多在贵族和部落头人手中,即政治文化仍充满权力分立特色。

大约在匈奴老单于(公元前174~前161年)末年,中国西北的大月氏游牧民族为匈奴所迫,逐渐西迁到中亚一带,到公元一世纪,大月氏联合中亚马萨该特等土著游牧部族共同攻入大夏,推翻了希腊化政权,建立了贵霜王朝。其崇信佛教的迦腻色迦王除已统治了中亚巴克特里亚、粟特外,还统治了西北直到花刺子模(今乌兹别克斯坦及阿富汗一带)的广大地区。由于贵霜领土曾达天竺(印度西北部),这时期印度文化也传入中亚。这是贵霜与中国、安息、罗马四大东西文明古国在丝绸之路上频繁交往的时期。可以认为贵霜王朝时期,中亚已开始形成了一种交融荟萃的复合文明的文化底蕴,这从贵霜王朝的钱币上“除了佛教以外,他们在钱币上还有印度其它诸神和女神以及伊朗和希腊、罗马的神祠^①”的记载中可见一斑。

贵霜王朝建立前,中国汉朝已经开始经营中亚。汉朝第一次于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通西域(含今新疆和中亚两河流域一带)时,大月氏尚未攻入大夏(即巴克特里亚),三年后(公元前135年),大夏的希腊统治者才失国。汉朝二次又派张骞于公元前119年出使西域,当时通西域的主要目的是联络乌孙共抗匈奴。那时,乌孙领地已

^① 纳拉因:《贵霜王朝初探》,《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在中亚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到伊塞克湖一带；此外，在费尔干纳一带有大宛，其北为锡尔河中下游迤北草原的康居，这时大月氏虽已征服大夏，但仍有部分居于妣水（阿姆河）北。以后汉朝通过遣使、联姻、通商等交往使乌孙及西域三十六国臣服于汉朝，又以对大宛的战争胜利，最终驱逐了匈奴势力对西域的威胁。

公元前60年（汉神爵二年），汉朝派郑吉为西域都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① 应该指出，汉代对中亚的大宛一带也用过兵，但乌孙等地的归汉却主要是张骞通西域及和亲、通使等和平外交取得的成果。乌孙、大宛的归汉使汉代所拓疆域及管辖地包括了乌孙领地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一带的中亚大部分地域。这样，西域与中原王朝有了正式的政治与商贸关系，中亚成为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也因此成为有世界性影响的古代强国。公元5世纪嚃哒王朝统治中亚，到公元7世纪，中国西北方的突厥族崛起，灭嚃哒王朝，并进入西域一带。唐朝派大军攻灭东突厥汗国，设安西都护府，后来又征服由中国西北进入中亚的西突厥，在中亚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虽然史载唐代普建府州“西尽波斯”^②，而较稳定管理的地区仍是汉代所开拓的中亚东部地区。所以，学者们常以帕米尔为界把中亚地区分为东部和西部。一般地说，中亚东部的文化受中国的影响比较大；中亚西部则受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的影响为多。经过中国汉、唐等朝对中亚的经营，唐朝在中亚不仅有驻军，有行政管辖，而且有屯田及通商、通使，但是总体看来，汉、唐在中亚的政权形式和政治制度，属羁縻府州制，虽比藩国制的隶属关系要紧密，但基本上仍是依靠当地游牧部落首领世袭相沿的自我管理。而且允许他们拥兵自重，造成中央王朝对他们的控制有限，加上经济的经营开发、文化的传播交融较薄弱，使唐朝也未能改变中亚各自为政的内涵政治以及文化的分散性和脆弱性。

① 《汉书》卷58~70，传[三]《郑吉传》（《汉书》第九册，3005~3006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

7 世纪阿拉伯帝国势力扩张到中亚,与唐朝军队发生激战。阿拉伯帝国逐步占有中亚,其中包括中国汉、唐王朝开拓的中亚领土。而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衰落下去,被迫撤出中亚地区。虽然到 9 世纪中亚人推翻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即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统治不过两个多世纪,但却在中亚大地撒下了伊斯兰文明的燎原之火,这是对中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特别是当时正值 9~10 世纪中亚伊朗语族土著民族建立自己的三个独立的本民族王朝时期:即公元 821~873 年的塔赫尔王朝、公元 873~903 年的萨法尔王朝和公元 874~999 年的萨曼王朝;也恰恰正是这一世纪里,萨曼王朝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表明伊斯兰文明在中亚开始生根。我们认为,正是由于中亚本土、本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的脆弱性,才会使恰好在这一时期起开始出现全盘伊斯兰化的奇迹般的文化变异的开端,接踵而来的则是大规模突厥化的惊人巨变。在中亚伊兰文明二十多个世纪的古代政治发展史上,仅仅有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基本属于中亚的本土民族政权,这实在称得上是令人感叹的昙花一现。中亚政治文化的脆弱性和缺乏独立精神的附属性也清晰凸现。从此除了现在的塔吉克斯坦地区保持了伊兰文明及原伊兰种族以外,其他中亚绝大部分地区开始了国家频繁更迭、种族变异、语言变更和宗教全盘伊斯兰化的文化底蕴的彻底改变。公元 999 年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系喀喇汗朝灭掉萨曼王朝以后,几乎每一个世纪更换一个王朝:12 世纪喀喇契丹(即西辽)和花剌子模两个突厥系王朝分占中亚;13~14 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蒙古风暴席卷中亚;14~15 世纪突厥帖木儿帝国统治中亚两河流域;15 世纪中叶以后乌兹别克突厥系进占中亚并建立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国;16 世纪的哈萨克和 18 世纪吉尔吉斯族在现代民族共同体形成基础上建立的也都是突厥语系民族政权。由此可见,政治文化对国家存亡、民族兴衰有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

中亚文化经历了三大巨变,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三大巨异之一一是当地民族的语言除了塔吉克语外几乎都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演变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之二是当地原欧罗巴人种民族大都混血化为突厥语族欧罗巴—蒙古人种;之三是原多种宗教信仰的当地主要民族几乎全部伊斯兰化为穆斯林民族,从而完全改变了中亚文明

的原伊兰文化主流基础。

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古代原中亚民族为塞(萨迦)人,属欧罗巴人种,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认为古代布满各类萨迦人的中亚“是伊兰人的根据地”^①,在国内,有关代表性著作如《塞种史研究》和《维吾尔研究》也都认为:“古代西域之住民系属于高加索种即所谓白种人之伊兰种人”,并认为汉初,月氏、乌孙亦为白种人。^②

笔者认为,虽然古代中亚已有少量蒙古人种的文化渗透现象^③,但大多属印欧语系民族,这是不能否认的。到11世纪时,大致尚未发生种族变异,然而,几个世纪后,中亚两河流域的居民,除了处于山区的塔吉克族尚保留了印欧语和欧罗巴伊兰人种以外,其他中亚广大地域的原居民竟完全异化成了欧罗巴—蒙古混合人种,即这里形成的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哈萨克等主体民族全部变异为改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民族了,这是一幅奇特的文化巨变的画面!

另外,中亚在前伊斯兰时期,原是五彩缤纷的多种宗教交相活跃的舞台,其宗教文化多元的状况也与其地处东西交通中枢地带的实际相吻合。塞人早期的宗教信仰为萨满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尤其后者在中亚广为流传。^④据史书记载,以后进入中亚的突厥语各族也曾信仰琐罗亚斯德教。《梁书·滑国传》记呾哒“事天神、火神”。中亚之回鹘信佛教直到明代方“有绝灭之势”。^⑤摩尼教、基督教及其支派景教,也曾盛行于中亚。^⑥其文化的复合荟萃现象也已为考古界所证实。1884年,俄国成立考古学会后,曾派遣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史教授维谢洛夫斯基去泽拉夫尚地区及费尔干纳一带,了解中亚的古代文物。维谢洛夫斯基初次在撒马尔罕发掘了阿甫拉西雅卜古

① 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②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 伯恩斯坦:《中亚境内天山、七河地区的古代文化》,转引自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58页。

④ 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⑤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489页。

⑥ 其传播于中亚的时间,我们认为大约为3世纪。摩尼教从楚河东渐传入新疆天山南路则较晚,当为武则天皇后时。